

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来自进口贸易和难民冲击的影响

林雨晨 席天扬*

摘要 近年来,以右翼民粹主义为代表的反全球化力量在欧洲政治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本文以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为对象,以进口贸易额衡量经济冲击,以各地区接收难民的规模衡量文化冲击,实证检验了影响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经济和文化机制。本文发现,右翼政党得票率受到发展中国家进口冲击的显著影响。同时,偏重经济议题的极右政党的得票率主要受到贸易冲击的影响,偏重文化议题的极右政党的得票率增长更显著地来自难民冲击。

关键词 贸易冲击,难民冲击,右翼民粹主义

DOI: 10.13821/j.cnki.ceq.2020.03.03

一、导 言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通过国际贸易和产业的全球布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得以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以贸易分工协作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和消费者福利(Lin and Monga, 2013; Feenstra and Weinstein, 2017)。这种全球化下的经济分工既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福祉,同时也是发达经济体资本追求最优回报,进而导致生产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其在产业构成上的表现为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同步进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全球价值链布局,利用资金、人力资本和科技优势发展高科技产业和金融服务业(Antras and Helpman, 2004)。然而,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型,在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和提高总体福利的同时,也会在国家内部形成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再分配效应。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因为进口导致的对于本国原有产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通信作者及地址:席天扬,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100871;电话:(010) 62766681;E-mail:tyxi@nsd.pku.edu.cn。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官员人事管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研究:基于激励、遴选和组织结构的视角”(8200904490)以及教育部重大基地项目“中外官员选拔及经济绩效比较研究”(16JJD790003)的资助。作者感谢李力行、林毅夫、聂卓、余森杰对于本文工作论文的评论和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业的冲击,都可能进一步形成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和社会稳定的压力(Stiglitz, 2002; Bussmann and Schneider, 2007)。当受冲击行业所在国的政府不能及时做出政策调整,对利益受损群体做出补偿时,在这些受损群体集中的地区就会凝聚形成排外的、反全球化的政治力量。

传统政治经济学文献从资源依赖、幼稚产业冲击、贫富差距和族群冲突等角度分析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Tybout, 2000; Goldberg and Pavcnik, 2007),通常认为左翼政党是反全球化的主力(Stokes, 1999; Milner and Judkins, 2004)。然而,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出现了日益增强的反全球化政治力量,并且这些势力往往来自政治立场偏右,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党和政治家。例如,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政府发起贸易争端,并对各主要贸易伙伴增加关税。在欧洲,法国国民联盟、奥地利自由党、荷兰自由党等极右政党成为反对全球化的主要政治力量。极右政党在西欧选举中的支持率从5.1%上升至13.2%,拥有的议会席位比例也从3.8%提高至12.8%(Inglehart and Norris, 2016)。

上述现象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哪些结构性和周期性的因素导致了反全球化的政治力量在发达国家内部集中出现?为什么反全球化的政治力量在欧洲政治中突出表现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其纲领每每从经济政策延伸到移民政策?由对于外来商品的排斥和对于外来移民的排斥所导致的右翼民粹主义倾向,二者有何区别及联系?本文试图在厘清右翼民粹主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冲击和文化冲击两个维度来分析全球化影响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因果机制。对已有文献的讨论表明,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进入,以及由地缘政治和文化全球化导致的发展中国家的入口进入(其极端形式为难民的进入),对于本已积弊甚多的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治理能力形成了更加严峻的挑战。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社会问题压力增大,在全球化中相对受损的民众投票给反对全球化和限制移民的右翼政党,以表达对自身处境恶化的不满。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和移民人口的进入并非导致发达经济体结构性问题的原因,而是由于西方国家自身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足以应对上述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人口缓解而不是加剧了西方国家的治理危机。因此,以封闭和排斥开放为终极指向的政治民粹主义尽管其来有自,却并非带领西方国家走出治理困境的良方。

本文采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得票数据,通过计算各个政党在NUTS-2(欧盟地域统计单位命名法二级行政单位, Nomenclature of Territorial Units for Statistics, 法语为 Nomenclature des unités territoriales statistiques, 缩写为 NUTS-2)地区层面的得票率来衡量政党的政治力量,考察进口贸易与难民冲击对不同政党政治力量的影响。基于 Autor *et al.* (2013)的方法,本文按照各地区的分行业工人的分布进行加权,构造了地区层面贸易冲击指数。

在文化冲击层面，根据难民接收与迁移的地理路线，建立地区层面的难民冲击指数。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的贸易量构造贸易冲击的工具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经济不平等、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失业率等相关因素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冲击显著增强了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本文进一步根据政党的发展历史、意识形态、政策偏好等因素将极右翼政党区分为经济和文化议题主导的极右政党，发现贸易冲击与难民冲击对两类政党的得票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对机制做出了讨论。

本文的其余部分承接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做出评述，第三部分提出理论假说，第四部分介绍数据并进行描述分析，第五部分讨论回归模型的设定并报告实证结果，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二、文献概述

在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文献中，从“需求侧”出发的研究强调经济因素对于选民投票倾向和选举结果的影响。实证研究中往往把经济景气和收入变化看作影响选民投票倾向的首要因素（Harrington, 1993; Brender and Drazen, 2008）。近来的文献发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进口加剧了发达国家本国制造业的失业（Autor *et al.*, 2013; Balsvik *et al.*, 2015; Acemoglu *et al.*, 2016; Pierce and Schott, 2016）、引发工资降低（Autor *et al.*, 2014; Utar, 2018），削弱了民众对自由贸易的支持（Mayda and Rodrik, 2005; Hanson *et al.*, 2007; Margalit, 2012）。

Autor *et al.* (2016) 基于2016年美国大选数据研究贸易冲击带来的政治极化效应，发现在选举中受来自中国的贸易冲击更大的地区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在对欧洲选举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贸易冲击导致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上升（Dippel *et al.*, 2015; Guiso *et al.*, 2017; Colantone and Stanig, 2018a, 2018b）。Colantone and Stanig (2018b) 针对西欧14国的研究发现，来自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冲击使得西欧选民更加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政党。

全球化同时增加了外来移民。研究发现欧美国家的外来移民导致本地就业和工资下降（Card, 2001; Ottaviano and Peri, 2008），强化了低技能工人对移民的抵制态度（Mayda, 2006; Card *et al.*, 2012）。基于选民党派偏好的研究发现，对外来移民的不满是导致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上升的重要因素（Ivarsflaten, 2008; Arzheimer, 2009; Inglehart and Norris, 2016; Rydgren, 2008）。近年针对欧洲各国的选举研究均发现，移民比例增加会导致选民更加支持极端右翼政党（Barone *et al.*, 2016; Halla *et al.*, 2017），影响机制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文化和人口结构方面的冲击（Mayda *et al.*, 2016）。

“阿拉伯之春”运动后进入欧洲各国的难民,是外来移民冲击的极端形式。一方面,难民没有投票权,且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难度高,对于本地居民的影响更多集中在文化和社会观念方面。另一方面,大多数难民并未返回各自国家,而是在当地从事各种非正规经济活动,增加了所在社区的不稳定因素。近期文献中,Altindag and Kaushal (2017)发现叙利亚难民涌入加剧了土耳其国内政治派别支持者之间的对立,使得建制派执政党支持率下降。Dustmann *et al.* (2016)对1986—1998年丹麦的难民安置的研究表明,难民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具有反移民立场的政党得票率。

本文对文献的贡献在于:第一,构造了地区层面的贸易和难民冲击指标,较好地区分了来自经济和文化不同维度的变化对于政党竞争的影响。第二,本文数据所覆盖的地区不仅包括西欧国家,也包括传统东欧地区的转型国家,更完整地剖析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政治经济学机制。

三、理论假说

政党得票率取决于选民的偏好和政党本身的政见以及意识形态(Lee *et al.*, 2004; Carsey and Layman, 2006),而选民的偏好又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发展而变化。全球分工和交换提高了参与国的总体福利水平,但各地区和行业所受贸易冲击的福利影响不尽相同,未必带来帕累托改进(Verhoogen, 2008; Autor *et al.*, 2013)。

借用Rogowski (1987)提出的包含土地、劳动力、资本三要素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我们试图梳理贸易影响选举政治的两条路径。首先,国际贸易的受益者会进一步支持自由贸易,而受损者会要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内政治的极化现象。其次,随着贸易的进程,国际贸易的受益者会寻求把经济优势转变为政治优势,发挥更大的政策影响力,由此激化政党之间的冲突。欧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是主要进口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冲击,使得低端制造业工人收入下降。因此,经济政策上主张去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制造业占当地劳动力比重较大的地区受到选民较高的支持(Autor *et al.* 2016; Colantone and Stanig 2018b)。

除去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导致的政治极化外,发达国家的增长停滞和产业衰退也容易引起选民对建制派政党的不满。选民投票给非主流政党兼有政治问责、选举惩戒,以及对建制派施政绩效否定表达性投票的意图(Barro, 1973; Hillman, 2010; Costas-Perez *et al.*, 2012)。在本地产业受到贸易冲击最集中的地区,选民更倾向于把经济增长的低迷归咎于全球化的政策,转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Rodrik, 2011)。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某地区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贸易冲击越大, 右翼政党在该地区得票率越高。

欧洲的右翼政党民粹化的另一特征是排外 (xenophobia)。Lee *et al.* (2006) 建立了基于税收和文化的二维政策空间的选举竞争模型, 证明了当下阶层选民的排外情绪足够强烈, 可能在税收政策上做出让步, 转而支持主张排斥移民的右翼政党。Alesina *et al.* (2001) 发现, 主流选民排斥少数族裔, 不愿承担对这些群体的社会福利成本, 是限制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原因。在欧洲政治中, 难民安置占用了公共福利资源, 可能导致本地居民对难民的排斥 (Altindag and Kaushal, 2017; Vadlamannati and Kelly, 2017)。根据上述理论文献我们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 2: 某地区受到的难民冲击越大, 右翼政党在该地区的得票率越高。

四、数 据

本文选择欧盟地域统计单位命名法下的第二级行政区 (NUTS-2) 作为研究单位¹, 考察地区层面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对右翼政党地区层面得票率的影响。虽然在政治上存在着主流右翼政党与极右政党的分野, 然而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难民冲击等问题, 使得民粹主义思想对欧洲的极右和主流右翼政党都产生了影响, 因此本文将把一般右翼政党也纳入研究对象, 而不是局限于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一) 欧洲议会选举

本文采用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政党在 NUTS-2 地区层面的得票率来衡量其支持率, 对于每一个 NUTS-2 地区 i 计算政党 p 在该地区的得票率 $VoteShare_{ip}$, 并将政党得票率与其政治立场结合, 对被归入右翼阵营的政党²得票率 $VoteShare_{ip}$ 进行加总, 得到右翼政党在该地区的得票率 $VoteShare_i$ 。选举数据来自各国的政府部门对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统计。³

欧洲议会是由成员国公民直选产生的议会机构, 与欧盟理事会共同负责起草欧盟法律、审议欧盟年度预算, 并承担对关税贸易、货币政策、市场竞争规则、环境保护、信息安全、移民政策等问题的立法。欧洲议会按成员国人口比例分配席位, 每五年选举一次, 议员按照直接普选、比例代表制的原

¹ 地域统计单位命名法是欧盟为其成员国、候选国及自由贸易国的国内行政区划设立的代号标准, 共分为三级。第一级行政区面积过大, 难以衡量一国内不同地区异质性的经济社会状况对选举结果的影响, 而第三级行政区在欧盟统计体系下缺乏足够的研究数据, 故而本文选择既能体现地区差异、又有较好数据可得性的第二级行政区。不过, 英国和斯洛文尼亚的选举数据在 NUTS-2 层面无法获得, 因此本文实证部分以这两国的 NUTS-1 地区为研究单位。

² 政党分类将在下一节进行详细介绍。

³ 具体数据来源留存备索。

则由各国单独选出,并根据所属党派的政治倾向在欧洲议会内部组成不同的党团(Hix *et al.* 2007)。

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首次欧洲议会选举。尽管欧洲议会选举被认为是“次等选举”(second-order election),对政策的影响力弱于本国政府选举,但选民仍以经济社会情况为依据进行投票。已有研究表明,由于欧洲议会的议员不参与国内政策制定,弱化了选民在投票中的策略性的行动,促使选民表达真实的政治倾向(Reif and Schmitt, 1980; Hobolt and Wittrock, 2011)。欧洲议会选举的这一特性使我们能够较准确地评估进口贸易冲击与难民冲击对选民政党偏好的影响,并缓解各国选举制度不同对选举结果的影响。

(二) 政党立场

本文选取2014年Chapel Hill Expert Survey (CHES) 衡量欧盟各国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CHES数据库由相关领域的专家评估欧洲各政党的意识形态位置及其对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多项议题所持立场。我们根据CHES中政党整体政治立场“lrgen”变量的定义(极左为0,中立为5,极右为10),把变量值大于5的政党定义为偏右翼的政党,并将变量值大于8的政党定义为极右政党。同时,本文对于经济和文化议题的政党立场做出区分。⁴采用CHES数据库中“lrecon”变量衡量政党在经济议题上的政治立场,并加总数据库中多项社会文化议题相关指标后进行标准化,得到衡量政党社会文化议题立场的综合指标。而后,我们在NUTS-2地区层面对政党得票率进行加总,得到地区层面不同类别政党的整体得票率。

表1反映了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超过全国1%的各类政党的数量和所获席位数,百分数表示其在地区层面的平均得票率。从中可见,右翼政党数量上升多于左翼政党,且极右翼政党数量明显增加、得票率显著提高,所获席位数亦大幅增长。在右翼政党内部,中间偏右和传统右翼政党势力减弱、极右政党壮大这一结构性的变化趋势反映了欧洲政治中的极化(polarization)倾向。而且,由于欧洲议会选举采取比例代表制,小党可以通过集中力量在某些地区竞选而当选议员,极右翼政党相对有限的得票率的上升可能导致政治权力更大幅度比例的增加。

⁴ 欧洲政坛上带有民粹色彩的右翼政党,可以进一步被分为两类(Betz, 1993, 1994; Mudde and Kaltwasser, 2017)。一类是带有较强排外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右翼民粹政党(nativist populist radical right),例如法国国民联盟,此类政党目前通过调整过于极端的右翼言论以期在选举中进入主流政坛,其政策重点在于社会文化政策上强调身份认同、反对外来移民;另一类则是从主流政党发展而来的新自由主义右翼民粹政党(neoliberal populist parties),例如英国独立党、意大利力量党,此类政党相对更强调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受全球化冲击要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同时逐渐带有民粹主义特征。

表1 各类政党数量、地区层面平均得票率变化

	政党数量		地区层面平均得票率		席位数量	
	2009年	2014年	2009年	2014年	2009年	2014年
偏左翼政党	75	87	41.99%	41.97%	311	314
偏右翼政党	92	113	54.62%	53.28%	424	417
极右翼政党	17	23	6.12%	10.12%	42	86

注：左翼、右翼、极右翼政党对应于CHES数据库中“lrgen”变量值小于5、大于5、大于8的政党；地区层面平均得票率为三类政党在NUTS-2地区加总得票率的均值；席位数量为三类政党分别获得的欧洲议会席位总数；选举数据来自各国的政府部门对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统计，政党席位数量来自欧洲议会网站⁵。

（三）贸易冲击

本文采用Autor *et al.* (2013)提出的“人均进口冲击”指数(import-per-worker)来衡量地区受到经济全球化贸易冲击的程度：

$$IPW_i = \sum_k \frac{L_{ik}}{L_i} \times \frac{\Delta IM_{ck}}{L_{ck}}$$

其中， c 代表国家， i 代表NUTS-2地区， k 代表在欧洲经济活动分类法2.0 (NACE Rev. 2.0)中制造业下属的各个行业。 ΔIM_{ck} 是一段时期内国家 c 在行业 k 的进口额变动值。我们关注来自劳动密集型国家的制造业贸易冲击，因此分别选择2014年联合国定义的107个发展中国家、Auer and Fischer (2010)定义的9个代表性低工资国家⁶、中国和金砖四国对欧盟各国的进口额变动值。由于上一次欧洲议会选举在2009年，故选取2010年和2014年的进口额之差衡量进口额变动。⁷

我们采用2010年国家 c 在行业 k 的就业总人数 L_{ck} 对该行业的进口变动额进行标准化。考虑到地区间贸易冲击差异，对标准化后的贸易冲击进行了加权，权重为2010年地区 i 在行业 k 的就业人数 L_{ik} 占2010年该地区就业总人数 L_i 的比值。最后，对各行业的贸易冲击进行加总，得出该地区整体贸易冲击。计算中所采用的贸易、就业数据⁸均来自欧洲统计局。这一指标的含义是，在给定国家层面行业雇佣比例后，地区层面贸易冲击的差异来自各地区

⁵ 政党席位数据来源：<http://www.europarl.europa.eu/meps/en/search/advanced>，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6日。

⁶ 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⁷ 此外，2008—2010年，欧盟经济活动分类法逐渐从1.1版本改为2.0版本，调整了制造业的具体分类，选取2010年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潜在的测量误差。

⁸ 缺失的就业数据按照增长率进行插补，同时删去了部分就业数据严重缺失的行业。

制造业专业化的差异,如果某一地区就业集中的行业是本国进口贸易较多的行业,则该地区受到贸易冲击的程度相对更大。通过这一指数,我们同时控制了地区的劳动力雇佣结构和制造业产业结构。

图1反映了欧盟28国来自欧盟外地区制造业进口占欧盟GDP比重在2000年之后的变化趋势。其中,来自非欧盟国家的进口额占GDP比重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来自发展中国家进口额占GDP比重已从3%上升至接近6%。在附表二⁹中,我们展示了欧盟28国对代表性低工资国家的进口贸易分布,发现进口集中在电子产品、电器、机械设备、服装及皮革制品等行业,对欧盟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造成了较为强烈的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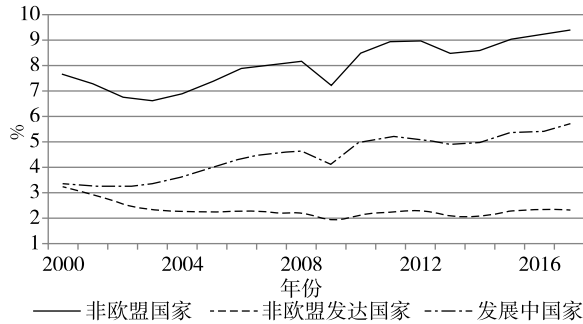


图1 欧盟外进口占GDP比重变化

注:数据来自欧洲统计局。

(四) 难民冲击

由于欧洲统计局仅有国家层面的庇护申请者数据,我们基于引力模型,结合NUTS-2地区*i*中人口最多的城市到地理距离最近的难民中转城市的对数距离倒数,构建地区层面的难民冲击(*Asylum proxy_i*)指标:

$$Asylum\ proxy_i = \frac{Asylum N_c}{\ln(distance_i)}$$

这一难民冲击代理变量主要考虑地理因素对难民分布的影响。根据欧洲国际边界管理署(Frontex)对难民进入欧洲的主要路线的划分,北非、中东的难民主要从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进入欧洲,并沿交通线继续北上,前往经济更发达、福利水平更高的西北欧各国。因此,地中海沿岸的几大港口城市 and 重要交通线特别是铁路沿线的城市地区成为难民最为集中的安置区域。结合欧洲境内主要交通线,本文得到难民进入欧洲的大致路线,并根据相关研究报告选择了16个位于重要交通线上、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主要难民中转城市¹⁰。

⁹ 因篇幅所限未列出,留存备索。

¹⁰ 中转城市列表见附表三,留存备索。

为剔除经济技术移民对选举结果、难民流入选择的影响，我们选取欧洲统计局2011年最新普查数据中NUTS-2地区出生在国外的居民数量来控制在本轮难民大量进入之前的地区层面移民情况。

图2展示了2011—2014年欧洲统计局在册的庇护申请者数量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2012年起，欧洲难民数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4年后增速明显加快，北非、中东地区的难民数量增长尤为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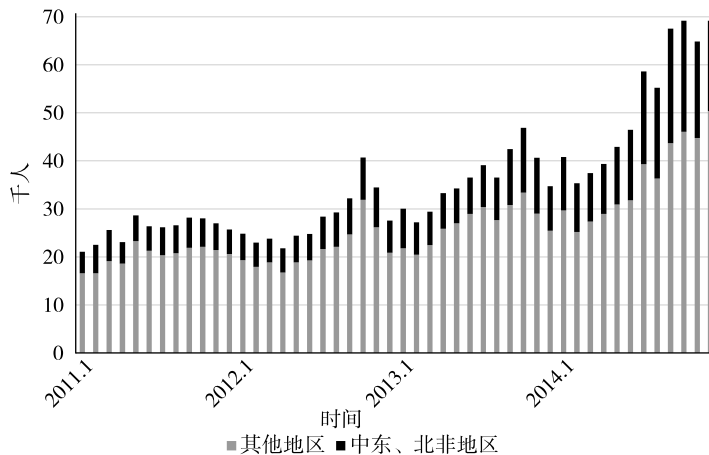


图2 2011—2014年欧盟28国难民数量变化趋势

注：数据来自欧洲统计局。

（五）控制变量

我们从欧洲统计局整理了2014年NUTS-2地区层面的外国居民人口、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失业率，以及国家层面的基尼系数等经济社会数据，在实证分析中作为控制变量。表2给出了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2 基准回归变量数据描述

变量名称	单位	观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右翼政党得票率	百分比	227	0.939	0.1297	0.5357	0.1644
发展中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欧元/人	227	19 890	-8 703	2 628	4 766
低工资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欧元/人	227	17 968	-5063	1 898	3 597
中国人均贸易冲击	欧元/人	227	15 317	-15761	1 013	2 964
金砖四国人均贸易冲击	欧元/人	227	15 257	-15 831	1 185	3 053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 1}	227	202 645	26	12 637	23 374
外国居民人口	人	226	2 994 930	3 572	211 526	326 131

(续表)

变量名称	单位	观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人均生产总值	欧元	227	87 600	3 800	25 582	13 248
人均可支配收入	欧元	224	26 000	2 900	14 653	6 119
失业率	[0, 1]	227	0.35	0.03	0.11	0.06
基尼系数	[0, 1]	28	0.36	0.25	0.30	0.03

注：得票率来自各国的政府部门对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统计，贸易、难民数据及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欧洲统计局。

五、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本文就贸易和难民冲击对于右翼政党得票率的影响建立如下的基准模型：

$$VoteShare_i = \beta_0 + \beta_1 IPW_i + \beta_2 \ln(AyslumProxy_i) + \gamma X_i + \epsilon_i,$$

其中 $VoteShare_i$ 为 NUTS-2 地区 i 右翼政党总得票率， IPW_i 为地区人均贸易冲击， $AyslumProxy_i$ 为地区难民冲击。 X_i 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外国居民人口、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失业率和基尼系数， ϵ_i 为误差项。回归分析中人口、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取自然对数形式。

表 3 报告了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贸易冲击的对应变量系数均为正并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从 2010 年到 2014 年，制造业工人人均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贸易冲击每增加 1 个标准差，该地区右翼政党得票率上升 2.95 个百分点，分别按照来自代表性低工资国家、中国和金砖四国的贸易冲击估算，也得到了相近的估计结果。而难民冲击对右翼政党得票率没有显著影响。此外，以发展中国家人均贸易冲击为例，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1%，右翼政党得票率下降 0.17 个百分点；失业率上升 1 个百分点，右翼政党得票率下降 0.58 个百分点；基尼系数上升 0.1，右翼政党得票率下降 18 个百分点。

上述结果显示了，受到制造业进口冲击后，经济利益受损的从业者更倾向于投票给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右翼政党。难民冲击对于右翼政党得票率的系数不显著，但稳健为正，其符号与难民冲击增加右翼政党得票率的假设一致。我们认为，难民冲击对不同地区、类型的右翼政党的得票率存在着异质性的影响。难民冲击会增加对于以文化和移民限制为主诉的右翼政党的支持率；而对于强调贸易保护主义的右翼政党，难民的进入并不会恶化当地选民的经济状况，因此也不会改变民众对该类政党的支持率，甚至可能导致其得票率的下降。右翼政党内部选票的再分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难民冲击为何对右翼政党整体得票率影响不显著。

控制变量中还有两个结果值得注意。第一，可支配收入与右翼政党得票

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地区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反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收入高的地区文化更加开放、多元，选民更支持欧洲一体化，在经济政策上赞同福利国家，反对右倾的经济政策。第二，基尼系数、失业率与右翼政党得票率负相关。不平等和失业率越严重，右翼政党得票率越低。我们认为，这个现象和右翼政党反对社会再分配政策、主张以减税推动经济增长有关。在欧洲政治中，政党在内、外经济政策上立场迥异的现象并非罕见。比如，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在提出减税主张的同时主张限制自由贸易。这一策略有利于右翼政党在由于新兴市场崛起而面临较大外部竞争压力的地区提高得票率。

表3 贸易冲击、难民冲击对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右翼政党得票率的影响

	(1)	(2)	(3)	(4)
发展中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295*** (0.0086)			
低工资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329*** (0.0079)		
中国人均贸易冲击			0.0363*** (0.0080)	
金砖四国人均贸易冲击				0.0391*** (0.0085)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003 (0.0063)	-0.0002 (0.0062)	0.0004 (0.0061)	0.0006 (0.0062)
外国居民人口	-0.0005 (0.0125)	-0.0005 (0.0124)	-0.0002 (0.0123)	-0.0005 (0.0123)
人均GDP	0.0155 (0.0605)	0.0108 (0.0574)	0.0063 (0.0552)	0.0051 (0.0570)
可支配收入	-0.1747*** (0.0594)	-0.1707*** (0.0558)	-0.1641*** (0.0535)	-0.1640*** (0.0553)
失业率	-0.5788*** (0.1638)	-0.5606*** (0.1565)	-0.5524*** (0.1546)	-0.5651*** (0.1570)
基尼系数	-1.8073*** (0.4156)	-1.8177*** (0.4129)	-1.8847*** (0.4091)	-1.7855*** (0.4086)
常数项	2.6494*** (0.2561)	2.6645*** (0.2519)	2.6570*** (0.2503)	2.6420*** (0.2480)
观测值个数	223	223	223	223
R ²	0.3956	0.4020	0.4060	0.4098

注：被解释变量为地区层面右翼政党整体得票率。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二) 工具变量

基准模型使用2010—2014年进口额变动来计算贸易冲击。对于因果识别的一个潜在挑战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民粹主义思想更易被接纳,而这些地区受到贸易冲击的负面影响往往也强于经济发达地区。为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计算了2003—2007年进口额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2003—2007年进口额和2010—2014年的进口额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另一方面,2003—2007年的时间段处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发生之前,彼时民粹主义政党尚未凭借民众对于建制派的不满获得强大的声势。因此,该变量有助于区分地区原有的进口贸易冲击水平和政治民粹主义的变动趋势,比较符合对于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

我们定义2007年人均贸易冲击为:

$$IPW07_i = \sum_k \frac{L_{ik}}{L_i} \times \frac{\Delta IM_{ck}}{L_{ck}},$$

其中, k 代表在欧洲经济活动分类法1.1中制造业下属的各个行业, ΔIM_{ck} 为2003年与2007年国家 c 在行业 k 的进口额之差。 L_{ck} 、 L_{ik} 、 L_i 分别是2003年国家 c 在行业 k 的就业总人数、地区 i 在行业 k 的就业人数、地区 i 就业总人数。与前文类似,我们分别计算了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低工资国家、中国和金砖四国的人均贸易冲击。

工具变量法的一阶段回归模型设置如下:

$$IPW_i = \delta_0 + \delta_1 IPW07_i + \gamma Z_i + \mu_i,$$

其中, Z_i 包含了取自然对数的难民冲击代理变量和基准模型中所有的控制变量,表4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一阶段回归的Kleibergen-Paap检验得到 F 统计值数值较大,倾向于支持不存在严重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在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上都与基准模型较为接近,制造业工人人均受到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冲击增加1个标准差,右翼政党得票率会增加2.3个百分点,按照代表性低工资国家、中国和金砖四国的人均贸易冲击估算也得到了接近的结果。

表4 贸易冲击、难民冲击对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右翼政党得票率影响:工具变量

	(1)	(2)	(3)	(4)
发展中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226*			
	(0.0122)			
低工资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265**		
		(0.0112)		

(续表)				
	(1)	(2)	(3)	(4)
中国人均贸易冲击			0.0275***	
			(0.0105)	
金砖四国人均贸易冲击				0.0250**
				(0.0113)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017	0.0014	0.0018	0.0017
	(0.0065)	(0.0064)	(0.0064)	(0.0064)
外国居民人口	0.0036	0.0039	0.0037	0.0033
	(0.0138)	(0.0138)	(0.0136)	(0.0136)
人均GDP	0.0043	-0.0019	-0.0014	0.0020
	(0.0673)	(0.0652)	(0.0631)	(0.0647)
可支配收入	-0.1736***	-0.1691***	-0.1665***	-0.1692***
	(0.0618)	(0.0592)	(0.0579)	(0.0597)
失业率	-0.5705***	-0.5558***	-0.5508***	-0.5624***
	(0.1595)	(0.1537)	(0.1524)	(0.1546)
基尼系数	-1.8696***	-1.8666***	-1.9296***	-1.8885***
	(0.4368)	(0.4229)	(0.4171)	(0.4235)
常数项	2.7073***	2.7237***	2.7111***	2.6977***
	(0.2640)	(0.2609)	(0.2595)	(0.2596)
观测值个数	213	213	213	213
R ²	0.3980	0.4059	0.4069	0.4078
一阶段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2014年人均贸易冲击				
2007年人均贸易冲击	0.7821***	0.7422***	0.7684***	0.747***
	(0.0523)	(0.0758)	(0.0851)	(0.0770)
Kleibergen-Paap F 统计值	223.81	95.87	81.43	94.15

注：被解释变量为地区层面右翼政党整体得票率。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三) 极端右翼政党

不同类型的右翼政党可能在经济、文化等维度上采取差异化的立场，同一种冲击对于聚焦于不同议题的右翼政党可能具有异质性的影响。在这一节，我们重点研究极右翼政党的得票率，根据第四部分第(二)节中衡量政党经

济和社会文化议题立场的指标, 分别讨论贸易、难民冲击对经济极右政党和文化极右政党的异质性影响。

如表 5、表 6 所示, 对于经济极右政党, 人均贸易冲击增加 1 个标准差导致得票率下降约 3.5 至 4 个百分点, 难民冲击增加 1% 使得票率下降约 1.3 个百分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制造业进口冲击使得制造业工人利益受损, 转而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而以经济议题为主的极右政党在社会文化政策上并无极端民粹主义主张, 难民冲击的增强并不会改变选民对这一类政党的政治偏好。

对于文化极右政党, 人均贸易冲击增加 1 个标准差导致得票率下降约 4.3 至 5.1 个百分点, 难民冲击增加 1% 使得票率增加约 3.5 个百分点。面对社会福利挤占、治安恶化以及对主流社会价值的冲击, 选民增加了对于主张文化保守主义、限制难民的极右政党的支持。可能因为文化上右倾的政党对于经济政策的关注度不够, 贸易冲击对其选举得票率的影响有限。

表 5 贸易冲击、难民冲击对经济议题下的极右政党得票率影响

	(1)	(2)	(3)	(4)
发展中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406*** (0.0067)			
低工资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385*** (0.0092)		
中国人均贸易冲击			0.0343*** (0.0089)	
金砖四国人均贸易冲击				0.0386*** (0.0091)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129*** (0.0042)	-0.0138*** (0.0042)	-0.0136*** (0.0041)	-0.0133*** (0.004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213	213	213	213
R ²	0.3349	0.2596	0.2679	0.3137

注: 本表中的回归为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结果, 一阶段 K-P F 统计值均大于 10。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 6 贸易冲击、难民冲击对文化议题下的极右政党得票率影响

	(1)	(2)	(3)	(4)
发展中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492*** (0.0083)			

(续表)				
	(1)	(2)	(3)	(4)
低工资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501*** (0.0096)		
中国人均贸易冲击			-0.0436*** (0.0087)	
金砖四国人均贸易冲击				-0.0513*** (0.0097)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342*** (0.0070)	0.0351*** (0.0072)	0.0349*** (0.0072)	0.0343*** (0.007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213	213	213	213
R ²	0.3310	0.2790	0.2871	0.2916

注：本表中的回归为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结果，一阶段 K-P F 统计值均大于 10。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四) 得票率的动态变化

我们进一步利用 2009 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计算 NUTS-2 地区层面右翼政党和两类极右政党在两次欧洲议会选举之间得票率的动态变化，缓解历史选举结果对 2014 年选举结果和在此期间的贸易、难民政策的同方向影响造成的估计偏误。

表 7 显示，贸易冲击越大的地区，右翼政党整体得票率增加越多，这一趋势也体现在经济上的极右政党中。与此同时，在贸易冲击更大的地区，文化极右政党的得票率增加较少；而难民冲击更大的地区，文化极右政党的得票率增加更多。这说明 2009 年以来，右翼政党和极右政党的得票率增加主要源于贸易冲击的增强，难民冲击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极右政党得票率的增加。

表 7 贸易冲击、难民冲击对各类政党得票率变化的影响

	右翼政党	经济极右政党	文化极右政党
发展中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267*** (0.0083)	0.0235*** (0.0080)	-0.0388*** (0.0069)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058 (0.0046)	-0.0009 (0.0043)	0.0312*** (0.0060)

(续表)

	右翼政党	经济极右政党	文化极右政党
低工资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334*** (0.0090)	0.0138* (0.0075)	-0.0332*** (0.0075)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059 (0.0046)	-0.0018 (0.0042)	0.0321*** (0.0063)
中国人均贸易冲击	0.0332*** (0.0089)	0.0090 (0.0065)	-0.0251*** (0.0064)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055 (0.0045)	-0.0020 (0.0042)	0.0323*** (0.0065)
金砖四国人均贸易冲击	0.0332*** (0.0089)	0.0090 (0.0065)	-0.0251*** (0.0064)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055 (0.0045)	-0.0016 (0.0042)	0.0316*** (0.0063)

注：每项贸易冲击和该项下一行的难民冲击为一组回归结果，对应于三类政党得票率变化的被解释变量，为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结果，一阶段 K-P F 统计值均大于 10；其中，右翼政党得票率变化为地区层面含极右政党在内的右翼整体得票率变化；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五) 影响机制

我们提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进口冲击，会导致制造业从业者经济利益受损，提高右翼政党与经济极右政党的得票率。同时，难民涌入对社会经济、主流文化的冲击，加剧了选民的排外心理，提高了文化极右政党的得票率。我们在本节进一步验证这个选票再分配机制。

我们使用个人层面的欧洲社会调查 (European Social Survey) 在 2014 年至 2015 年进行的第七轮调查，检验了个人经济状况受威胁程度与对外来移民的态度如何影响选民的立场和投票行为。将调查中“上一次全国性选举投给了哪一个政党”、“认为个人政治立场与哪一个政党最为接近”这两个问题与政党立场匹配，得到受访者政治立场是否最接近极右政党、是否投票给文化极右政党、是否投票给经济极右政党三个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我们使用三个变量衡量个人经济状况受到的威胁程度，分别是是否有三个月以上的失业经历、获得收入的难易程度 (取值 1—4 的离散变量，数值越大、难度越大)、社会保障是否为主要收入源。同时，使用三个变量衡量个人对外来移民的态度，分别是对外来移民对本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以及整体上的影

响（取值0—10的离散变量，数值越大、评价越消极）。

表8显示，反移民态度和家庭收入风险增加会导致选民个人政治立场进一步向极右倾斜，这与基准回归中地区层面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右翼得票率越低的结果一致。反移民态度还会增加选民对于文化极右政党和经济极右政党的支持。收入风险与失业经历则带来了异质性的影响，在增加选民对文化极右政党的支持的同时，降低了选民对经济极右政党的支持。个人层面的实证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机制，即贸易冲击对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以及难民涌入对于本地民众的文化冲击导致了欧洲右翼势力的上升。

表8 经济状况、对外来移民态度对个人政治倾向与投票选择的影响

	(1)	(2)	(3)
	接近极右翼政党立场	投票至文化极右政党	投票至经济极右政党
收入风险	0.0051*	0.0051**	-0.0213***
	(0.0031)	(0.0024)	(0.0032)
失业经历	-0.0059	0.0122***	-0.0187***
	(0.0042)	(0.0035)	(0.0047)
社会保障依赖	0.0016	-0.0108	-0.0112
	(0.0092)	(0.0070)	(0.0084)
移民经济影响	0.0055***	0.0048***	-0.0025*
	(0.0012)	(0.0010)	(0.0013)
移民文化影响	0.0091***	0.0063***	0.0036***
	(0.0013)	(0.0010)	(0.0014)
移民整体影响	0.0043***	0.0031***	0.0032**
	(0.0014)	(0.0012)	(0.001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213	213	213
R ²	0.3426	0.3488	0.3546

注：被解释变量为个人政治立场是否与极右翼政党最为接近、是否投票给文化极右政党、是否投票给经济极右政党；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是否为少数族裔、是否为居住国公民、工作行业；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六、结 论

本文利用欧洲议会选举中地区层面的政党得票率数据,实证研究了欧洲社会近年来所受的贸易和难民冲击对右翼政党势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进口贸易冲击与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显著相关。利用历史上的贸易冲击作为工具变量回归以及得票率的动态变化为被解释变量所得到的结果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分析结果一致。贸易冲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经济议题为主的右翼政党,难民冲击的影响则对以文化议题为主的右翼政党更加显著。

本文的发现具有两点启示。首先,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各国经济增长和总体福利水平增加的同时,在国家内部可能造成结构性冲击,加剧收入和经济机会分配不平等。随着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经济竞争,这种冲击将是长期和结构性的,这也意味着本文所揭示的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政治倾向可能是一种长期趋势。正如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全球化的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一书中提出,经济全球化、政策自主和政治代表性之间存在“不可能三角”。如果欧洲各国希望能够维护社会利益的广泛诉求,对受损群体实行保护,就必须对经济开放加以限制。在国际贸易争端频繁发生的今天,认识到这种趋向的结构性因素对于理解和应对西方国家的政策转向有一定现实意义。

其次,本文的发现也表明西方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个不断走向多元和开放的单向过程。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在20世纪的横行,某种程度上来源于对于全球化冲击的政治反应。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失败和多元文化造成的社会价值观冲击,使得极端的右翼政治观念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基于地缘政治和转嫁自身内部矛盾而在北非等国采取的干预策略,在导致被干预国家政治动荡的同时也引发了难民和移民的涌入,对于西方国家的福利体系和治理能力造成更加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化产业重构和移民、难民的多元文化的双重冲击下,准备不及的西方社会政治精英和民众在匆忙中拥抱了右翼民粹主义,以人民之名行封闭之实,对于治理积弊开出错误的药方,终将反噬自身。

参 考 文 献

- [1] Acemoglu, D., D. Autor, D. Dorn, G. H. Hanson, and B. Price, "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6, 34 (1), 141-198.

- [2] Alesina, A., G. Edwar, and B. Sacerdote, "Why Doesn't the US Have a European-Style Welfare System?",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1, No. w8524.
- [3] Altindag, O., and N. Kaushal, "Do Refugees Impact Voting Behavior in the HostCountry? Evidence from Syrian Refugee Inflows in Turkey", IZA Discussion Paper, 2017, No. 10849.
- [4] Antras, P., and E. Helpman, "Global Sourc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2 (3), 552-580.
- [5] Arzheimer, K., "Contextual Factors and the Extreme Right Vote in Western Europe, 1980-2002",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9, 53 (2), 259-275.
- [6] Auer, R., and A. M. Fischer, "The Effect of Low-Wage Import Competition on US Inflationary Pressur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0, 57 (4), 491-503.
- [7] Autor, D., D. Dorn, and G.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 (6), 2121-68.
- [8] Autor, D., D. Dorn, G. H. Hanson, and J. Song, "Trade Adjustment: Worker-Level Evide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129 (4), 1799-1860.
- [9] Autor, D., D. Dorn, G. H. Hanson, and K. Majlesi, "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6, No. w22637.
- [10] Balsvik, R., S. Jensen, and K. G. Salvanes, "Made in China, Sold in Norway: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an Import Shock",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5, 127, 137-144.
- [11] Barone, G., A. D'Ignazio, G. Blasio, and P. Naticchioni, "Mr. Rossi, Mr. Hu and Politics: The Role of Immigration in Shaping Natives' Vo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6, 136, 1-13.
- [12] Barro, R., "The Control of Politicians: An Economic Model", *Public Choice*, 1973, 14 (1), 19-42.
- [13] Becker, G. S.,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3, 98 (3), 371-400.
- [14] Betz, H. G., "The Two Facts of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Review of Politics*, 1993, 55 (4), 663-85.
- [15] Betz, H. G.,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Springer, 1994.
- [16] Brender, A., and A. Drazen, "How Do Budget Deficits and Economic Growth Affect Reelection Prospects? Evidence from a Large Panel of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 (5), 2203-2220.
- [17] Bussmann, M., and G. Schneider, "When Globalization Discontent Turns Violent: Foreig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nal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7, 51 (1), 79-97.
- [18] Card, D., "Immigrant Inflows, Native Outflows, and the Local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Higher Immigratio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1, 19 (1), 22-64.
- [19] Card, D., C. Dustmann, and I. Preston, "Immigration, Wages, and Compositional Amenitie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2, 10 (1), 78-119.
- [20] Carsey, T., and G. Layman, "Changing Sides or Changing Minds?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Policy Preferences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6, 50 (2), 464-477.

- [21] Colantone, I., and P. Stanig, "Global Competition and Br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8a, 112 (2), 201-218.
- [22] Colantone, I., and P. Stanig, "The Trade Origins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mport Competi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in Western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8b, 62 (4), 936-953.
- [23] Costas-Perez, E., A. Sole-Olle, and P. Sorribas-Navarro, "Corruption Scandals, Voter Inform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2, 28 (4), 469-484.
- [24] Dippel, C., R. Gold, and S. Heblich,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 Content: Trade Shocks and Voting Behavio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5, No. w21812.
- [25] Dustmann, C., K. Vasiljeva, and A. P. Damm, "Refugee Migration and Electoral Outcomes",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Migration, 2016, 1-71.
- [26] Feenstra, R., and D. Weinstein. "Globalization, Markups, and US Welfa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7, 125 (4), 1040-1074.
- [27] Goldberg, P. K., and N. Pavcnik,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7, 45 (1), 39-82.
- [28] Guiso, L., H. Herrera, M. Morelli, and T. Sonno, "Demand and Supply of Populism",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2017.
- [29] Halla, M., A. F. Wagner, and J. Zweimüller, "Immigration and Voting for the Far Right",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7, 15 (6), 1341-1385.
- [30] Hanson, G., K. Scheve, and M. Slaughter, "Public Finance and Individual Preferences over Globalization Strategies", *Economics & Politics*, 2007, 19 (1), 1-33.
- [31] Harrington, J., "Economic Policy,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El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 (1), 27-42.
- [32] Hillman, A., "Expressive Behavior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 26 (4), 403-418.
- [33] Hix, S., A. G. Noury, and G. Roland, *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4] Hobolt, S. B., and J. Wittrock, "The Second-Order Election Model Revisited: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Vote Choices in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Electoral Studies*, 2011, 30 (1), 29-40.
- [35] Inglehart, R., and P.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arvard Kennedy School Working Paper, No. RWP16-026, 2016.
- [36] Ivarsflaten, E., "What Unites Right-Wing Populists in Western Europe? Re-Examining Grievance Mobilization Models in Seven Successful Cas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8, 41 (1), 3-23.
- [37] Lee, D., E. Moretti, and M. Butler, "Do Voters Affect or Elect Policies? Evidence from the U. S. Hous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119 (3), 807-859.
- [38] Lee, W., J. Roemer, and K. V. Straeten, "Racism, Xenophobia, and Redistribution",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6, 4 (2-3), 446-454.
- [39] Lin, J. Y., and C. Monga,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Silver Bullet of Industrial Policy", *The Industrial Policy Revolution I*, 2013, 19-3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40] Margalit, Y., "Costly Jobs: Trade-Related Layoffs, Government Compensation, and Voting in US

-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1, 105 (1), 166-188.
- [41] Margalit, Y., “Lost in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Popular Discont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2, 56 (3), 484-500.
- [42] Mayda, A. M., “Who Is Against Immigration?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of Individual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6, 88 (3), 510-530.
- [43] Mayda, A. M., and D. Rodrik, “Why Are Some People (and Countries) More Protectionist than Oth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5, 49 (6), 1393-1430.
- [44] Mayda, A. M., G. Peri, and W. Steingress, “Immigration to the U. S. : A Problem for the Republicans or the Democra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6, No. w21941.
- [45] Milner, H., and B. Judkins, “Partisanship, Trade Policy, and Globalization: Is There a Left-Right Divide on Trade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4, 48 (1), 95-119.
- [46] Mudde, C., and C. R. Kaltwasser, *Populism :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47] Ottaviano, G., and G. Peri,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Wages: Clarifying the Theory and the Empiric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8, No. w14188.
- [48] Pierce, J. R., and P. K. Schott,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 (7), 1632-62.
- [49] Reif, K., and H. Schmitt, “Nine Second-Order National Election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European Election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80, 8 (1), 3-44.
- [50] Rodrik, D.,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 Why Global Markets , States , and Democracy Can't Co-exi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51] Rogowski, R.,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Changing Exposure to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7, 81 (4), 1121-1137.
- [52] Rydgren, J., “Immigration Sceptics, Xenophobes or Racists? Radical Right-wing Voting in Six West European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8, 47 (6), 737-765.
- [53] Stiglitz, J. E.,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2.
- [54] Stokes, S.,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9, 2, 243-267.
- [55] Tybout, J. R., “Manufacturing Fi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 Well Do They Do, and Wh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0, 38 (1), 11-44.
- [56] Utar, H., “Workers beneath the Floodgates: Low-Wage Import Competition and Workers' Adjustment”,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8, 100 (4), 631-647.
- [57] Vadlamannati, K. C., and G. Kelly, “Welfare Chauvinism? Refugee Flows and Electoral Support for Populist-right Parties in Industrial Democracies”, MPRA Paper, 2017, No. 81816.
- [58] Verhoogen, E. A., “Trade, Quality Upgrading, and Wage Inequality in the Mexican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123 (2), 489-53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ight-wing Populism

—Evidence from Trade Shocks and Refugee Crises

YUCHEN LIN TIANYANG XI*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the rising support for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an politics. We rely on the outcomes of 2014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mechanisms that fuel this trend. Using import competition to measure economic shocks and regional level refugee crises to measure cultural shocks, we find that regions exposed to more intense import shocks are more likely to vote for right-wing parties. We further show the increasing support for economic extreme right-wing parties is mainly caused by import shocks, and the electoral support for cultural extreme right-wing parties stems mainly from refugee shocks.

Key Words trade shocks, refugee crises, right-wing populism

JEL Classification F60, F16, J15

* Corresponding Author: Tianyang Xi,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No. 5 Yih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871, China; Tel: 86-10-62766681; E-mail: tyxi@nsd.pku.edu.cn.